

● 综 述

‘99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肖 亮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肖 亮 (1956-),男,浙江宁波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 206.6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144-02

为纪念闻一多诞辰 100 周年,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和武汉大学联合在武汉举办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从 9 月 20 日开始,为期 4 天,到会专家学者及闻一多先生的亲属、学生共计 110 余人,其中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 12 人。与会者提交论文 50 余篇,就闻一多的人生道路、人格和学术品格、古典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诗歌创作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一)关于闻一多的人生道路,李曦沐(国家测绘局原局长)、洪铭德(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认为他是从书生转变为民主斗士,最后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龙泉明(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闻一多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追求真理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宋剑华(湖南师大中文系教授)等认为闻一多一生追求的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人格的自由,应该把闻一多纳入纯学术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孙玉石(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同意此说,认为闻一多所献身的“自由”是为人民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对于这样一个本已“意识形态化”了诗人,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是不可能的。

(二)对于闻一多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与会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刘川鄂(湖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认为,闻一多是一个文化爱国主义者,其文化优越感大异于五四新文化主将们,这反映了一种受辱后的心理防卫机制。他的爱国诗篇有不少感人肺腑的佳作,但也有一些盲目狭窄的作品,与五四时期以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为总主题的现代爱国主义思潮有所偏离。

另一些学者则剖析了闻一多的文化心态。孙党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他既不拒斥,也不盲从,而是认真吸取,使其中国化、现代化;在文化的伦理道德层面上,闻一多理智上趋新,行为上守旧,表现出矛

盾的状态。杨洪承(山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认为欧美文化为闻一多提供了 3 方面的精神资源,一是激发了对美的追求;二是培养了具体与直觉并重的思维个性;三是影响了他的艺术实践。许祖华(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着重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探讨了闻一多的“恋旧情结”,认为他青睐中国传统中“德”与“美”的文化。德,表现为赞赏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的人物。美,包括对中国画与中国诗的赞美,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与艺术精神的钟情与强调。他认为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盖出于爱国、救国和建立新文学民族风格的目的。它们既外在决定了闻一多恋旧情结的所指对象,也内在决定了他恋旧情结的价值。

(三)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他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品格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黄曼君(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认为“闻一多现代人格精神的形成,既决定于儒道融合的楚骚文化和西方‘两希’文化的多元文化根基,也决定于五四运动和 40 年代民族文化反思的特殊时代因素,同时还决定于他个体信仰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闻一多的人格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开放性与坚韧性,这种开放性渗透在他的创作、学术、诗学和社会理想之中,而坚韧性则体现在他的英雄理想、人格自守、恃心傲物和‘杀身成仁’的气质与意志之中。”他的学术品格,则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与清人考据学巧妙的结合,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与西方的实证方法融为一体,形成了严谨而开阔的学风。

(四)闻一多在古典文学、文学史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与会的学者把他这方面的成果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显示出对闻一多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董乃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认为闻一多是唐诗研究鉴赏学派在现代的杰出代表,他在唐诗鉴赏研究中有 5 大特色,即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强烈深沉的历史感,突出的美感分析,用诗化的语言说诗,指向哲理的升华和规律的总结。

陈良运(江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充分评价了闻一多慧眼识《易林》,认为他对《易林》思想艺术特征和文学史价值的把握相当准确,可惜这是一项未完成的研究成果,致使他在中国文学史撰写方面的一大开拓之功未能广为人知。袁千正(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朝(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认为闻一多把校刊、训诂、考据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善于把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等进行研究,气度恢宏,见解独特。曾祖荫(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认为闻一多提出的“宇宙意识”,近似于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征。韩格平(东北师大古籍所教授)对闻一多未刊手稿 63 种作了介绍。李思乐(东北师大古籍所副教授)提交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校读记。程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考察了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一文的民俗学价值。李尔重(闻一多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原河北省省长)提交了长篇论文《龙的文学》,把闻一多有所涉及的对龙文化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主要以诗人名世,因而相当多的与会学者把目光投注于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成就。孙玉石认为闻一多完成了中国古代解诗学向现代解诗学的转变,具体表现为:(1)确立了解读古典文本的超越观念,即摆脱儒家诗学的樊笼,实现对于诗的理解由神性到人性的复归;超越时间迷雾造成的理解作品的困难,求得“相对”的“客观”的意义;超越文化的差异,走进古代诗人的心理。(2)引入西方现代学说的文本解读。(3)回归文学艺术本体的审美追求。闻一多关注诗的神秘性、幻象美和字义疏证,重视诗的隐喻、象征和多义性,这些也构成了他的现代解诗学的重要内容。吕进(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教授)认为闻一多在诗体大解放的“第二天”提出新诗的规范化问题,堪称新诗“创格”第一人。他的创格,既是指现代格律诗的创立,也是指自由诗的美学提升,在当时和当下的诗体重建中,都具有启示的意义。黄济华(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认为“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有悖于闻一多关于新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在继承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学习和发展闻一多的理论,实现新诗的规律化。程凯(北大中文系博士生)认为闻一多诗论中的“幻像”,是针对早期白话诗的粗疏和直露提出来的,它不只是“奇异的感受”,更是一种诗歌技巧。他的“均齐”,为过于浪漫化的新诗注入了一些古典美学的品格。莫海斌(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认为闻一多的形式观具有双重的涵义,既指“质料的形式观”,也指“内容的形式观”。前者是诗歌的形式化构造,其中有内形式(情感和幻象)和外形式(音节和绘藻)的区分。后者则把律诗和新诗格律区别开来——新诗格律是因情赋体,回应着内容的不同要求。“质料的形式观”的引入,使传统意义

上服务于内容的、技巧层面的形式获得了相对的自足性,“内容的形式观”也改造了“质料的形式观”,引发了闻一多关于“纯形”和“意义”的矛盾。

陈国恩(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认为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标志着新诗开始整合与古典诗词的关系,走向了诗艺的自觉。闻一多从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转向通过意象来间接地抒情,使诗意趋向凝炼。在浪漫主义诗风经过格律化运动再向现代派诗艺前进的过程中,闻一多不仅自己广泛吸收了西方诗歌,包括现代派诗艺的营养,超越了他自己大力推动的格律诗派,而且他是整个这一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陈卫(广西师大中文系博士)认为闻一多写自然意象的诗篇多为早期创作,风格秀丽而神奇;含有人文意象的诗篇渐入创作佳境,如“死水”、“静夜”等意象是他的专利。从自然意象向人文意象的转变,是闻一多诗歌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的过程,标志着他意象内质从传统走向现代。刘殿祥(山西雁北师院中文系讲师)认为闻一多的《死水》集是以主体精神历程为顺序编排而成的,构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圆形结构,展示了诗人的情感体验、人生思考和现实情怀。张洁宇(北大中文系博士生)指出闻一多与现代派诗人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是在对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的反拨中实现了自我的。栗山千香子(日本中央大学教师)读解了闻一多的两首“鬼诗”《天安门》与《夜歌》。江川静英(日本青森大学副教授)剖析了闻一多诗中花的形象和意象。

运用比较方法对闻一多的新诗与中外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陆耀东(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闻一多对待中国古诗的态度,不同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他主张精神继承传统,技巧不妨西化。他的诗承继传统诗歌的爱国气节和维护人格独立与尊严的精神,在新意境的构建、幻象的展示、表达感情的方式以及词语运用上都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铃木义昭(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围绕《改造》杂志“现代支那号——夏季增刊”上撰稿的中国文人、学者以及该期刊载的闻一多诗《春光》徐志摩诗《海韵》等作了颇有意义的考证,来透视 1930 年以后中日两国的文化和两国关系的状况。乔伟(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以德文诗的用韵形式为参照,讨论了闻一多诗歌格律的若干特色。

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探讨了闻一多的绅士风度。江锡铨(江苏教育学院教授)就闻一多对鲁迅文学传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接近、学习、继承、发扬作了梳理。孔庆东(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分析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王欣欣(湖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讨论了闻一多的文化观点,也都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责任编辑 何良昊)